

在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
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
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
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毛泽东同志最近指出：“看来
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
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

中 央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
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它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
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
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
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
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
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
提出了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
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
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
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

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不同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采用这种方法吧？那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問題。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的领导对他们做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地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个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

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得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見，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象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多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見，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沒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沒有民主不行。当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沒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見。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問題还不了解，有意见還沒有发表，有气還沒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沒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沒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沒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問題，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各级党委是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认真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问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的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雅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议论纷纷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

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沒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沒有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做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党委领导下通过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沒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不会稳。沒有民主，沒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沒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們应当联合那一些階級？压迫那一些階級？这是一个根本立場的問題。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法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敌人，大占约全人口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站到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認識客观世界的問題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些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沒有过大风大浪，沒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還沒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就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時間內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信，沒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大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说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沒經驗到有經驗，从有较少的經驗，到有较多的經驗，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可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

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还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才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他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经过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样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的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好的发展起来，要往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又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的多一点，因而把时间想的长一些。三百几十年建设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复地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用过去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地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的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的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的懂得农业，还要懂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分工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煤、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

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中，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这三种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作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特高级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动员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可以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看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套整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即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作的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的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

些釘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經驗，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败經驗，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造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份，主要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大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

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于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地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作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密秘的反对派，这些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有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迦里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极恶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

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付市长，过去秘密投降过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沒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滿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正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的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怒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地方，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爭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請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請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靜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清华大学鲁迅战斗小组翻印 1966.12.23

（凡是有错误之处，有我们负责）

北京机械工业局翻印 1967.1.14

編者的話：我们得到这篇讲话，看了之后，感到对于当前运动有指导意义，故翻印。为了使全院更多的人能学习，所以铅印了这篇讲话。由于时间有限和其它困难，不能查对原稿，因此不能算做正式文件，请同志们不要引用，不要外传。

希望红旗战士及全院革命同志好好地学习这篇讲话。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宣传组再翻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毛主席早年革命活动

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現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林 虬

一九一一年春，毛泽东同志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在这里研读了同盟会的书刊，并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一九一二年冬至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图书馆博览群书。

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同志考入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学习了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毕业，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锻炼，一方面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

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同志在《明耻篇》封面上写：“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十六字。（五月七日袁世凯与日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师范同学400多人参加“人物互选”。共选出34人，毛泽东同志被选上，并且得票最多（49票）被选项目最多（教品、健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精辟地说明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辩证关系，笔名：二十八画生（因为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

一九一七年暑假，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休息期间深入农村调查，访贫问苦，行程达九百余里。同学的评语是：“身无半分，信游天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用第一师范学友会的名义亲自主办工人夜校，他当时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工人夜校招生广告”，亲自发动工人入学。一月九日夜校正式开学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上课说明书”逐条地向学生讲解。毛泽东同志并担任历史课，在《夜校日志》中提出了教学内容少而精的主张。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团结湖南进步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后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动革命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参加新民学会的还有蔡和森、何叔衡等同志，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一九一八年秋，毛泽东同志为组织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后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创刊。《湘江评论》是由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是“五四”时期思想性最高的革命刊物之一。刊物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指出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

一九一九年冬，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人民开展驱逐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张敬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起草了驱张宣言。

一九二〇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精心研究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

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九二〇年春（夏）毛泽东同志召集旅沪新民学会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学会的宗旨，会员条件和会务方针，与会会员并在上海半淞园合影。

一九二〇年七月至一九二二年冬，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任，兼师范部国文教员，以教育工作为掩护，领导革命斗争。

一九二〇年七月为了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文化书社旧址即现在新华书店外文门市部），至一九二一年文化书社即分布于湖南各地。

一九二〇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〇年冬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深刻地批判了修正主义反动理论，鲜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如在中国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我们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党纲，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陈潭秋同志、何叔衡同志、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等十二人，代表了当时全国五十七名党员。当时开会的会址在上海望志路108号（即现在兴业路108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开会期间，为帝国主义察觉，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大会继续举行，胜利地完成了大会的议程。现在嘉兴南湖有当年继续举行大会的游船的复制品。

一九二一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同志任湖南区委书记，为了培养革命干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自修大学，对党团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三年（约一年半）毛泽东同志与杨开慧同志及杨母住在长沙市清水塘22号。清水塘旧址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利用附小校长身份租的房子，实际上是当时秘密的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所在地。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兼任湖南分部主任。

一九二一年冬毛泽东同志到安源考察工人运动。

一九二二年九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

一九二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举行大罢工，并派郭亮同志组织工人进行英勇阻车斗争。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长沙六千多名泥木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首任总干事。

一九二三年初毛泽东同志派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到衡山县建立“岳庄农工会”，开展农民运动。这是全国最早的农会组织之一。

一九二五年二月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韶山，深入了解贫雇农的生活和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着手研究解决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农民问题。他在韶山时，经常把附近的农民请到家里，通俗地向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家里也就成了农民的政治学校。毛泽东在此培养了一批农民骨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湖南农村也就是中国农村中最早的党组织之一——韶山党支部。

同时，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家乡韶山组织“雪耻会”开展农民运动，用打倒列强，誓雪国耻作号召，组织农民和吸引一些有觉悟的贫苦知识分子参加。后来韶山党支部相继成立，“雪耻会”的领导有了核心，组织迅速壮大起来。良田、如意等邻近地区的农民也纷纷加入。毛泽东同志到过这个组织，积极领导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阻止地主运粮出境，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地主豪绅把“雪耻会”称作“过激党”，非常害怕。是年秋，毛泽东同志到了广州后，曾指示“雪耻会”应改为公开的农民协会组织。一九二六年以韶山“雪耻会”为基础，正式成立“湘潭西二区农民协会”，使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一九二五年秋，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的领导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到五届是党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办的，主要培养广东本省的农运干部，毛泽东同志建议应培养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党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由“农民运动委员会”决议，由毛泽东同志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决议载《中国农民》月刊）。一九二六年三月筹备第六届，五月一日开课，九月结束，培养了327名学员，来自二十个省的农运干部。

毛泽东同志除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负责领导外，还亲自给学员上课，他亲自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四门课程。

毛泽东同志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扭转了讲习所的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①由培养广东地区的农运干部改为培养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②实行军事训练，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武装斗争思想，第六届学员增加了军事训练课目，学员穿的是军装的过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进行了实弹射击。毛主席亲自推荐赵自选同志（黄埔军校第一届优秀毕业生）担任军事教员。周恩来同志当时也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③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第六届学员毕业前，农讲所组织学员到农村进行农村调查，并写出了农村调查报告。

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民》月刊上发表伟大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光辉著作的发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据现在估计，这篇光辉著作就是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中写成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湖南是当时农民运动最高涨的地区之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并通过了剗除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等项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光辉著作，发表在《战士第三十五、六期》上。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初，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杀害了阳新革命同志，为了反击蒋介石集团反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请愿示威，要求惩办蒋介石，并开会追悼阳新死难烈士，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追悼会，在会上指出必须下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进攻，才能达到革命的真正目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继续训练大批革命干部（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革命中心从广州转移到武汉，当时的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七年春由广州迁至武昌）。这届讲习所三月开课，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于六月就结束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为了使全国农民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农民协会代表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等同志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当时发表了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一九二七年九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以及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失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以毛泽东同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浏阳的文家市集合部队，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形势，确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随即向井冈山进军。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整编了队伍，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上奠定了新型革命军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率领队伍到达井冈山后，建立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登险峰》战斗队翻印 1967.1.12.

北航《红旗》宣传组再翻印

1967年2月19日